

“连带”与“脱亚”的共谋

——近代早期日本“亚细亚主义”悖论性格之新探

万齐岭

(福建师范大学 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探究近代日本早期“亚细亚主义”的发展脉络不仅能捕捉日本的对外制策趋势和舆论导向,还有助于理解作为亚洲一国的日本何以坚持对东亚乃至世界发动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千百年来,对华夷秩序“中心”的反叛与对抗几乎贯穿了身处区域秩序边缘的日本的所有对外政策,地处华夷秩序版图的“边缘”使得日本具有将大陆“中心”相对化并克服的可能,而这也是造成早期亚细亚主义悖论表述的深层历史原因。幕末明治初期,西力东渐给日本摧毁旧华夷秩序的机会,此时“亚细亚主义”指向亚洲内部,日本表面宣扬“亚洲连带”一致对外,私下却迅速“西化”并染指东亚,并在实现对清平等后逐步由“亚洲连带论”走向公然侵亚的“脱亚论”。两者间看似言论相斥,实乃侵略扩张的一体两面,“连带”与“脱亚”的正反表述在甲午胜出的事实面前划为同一。

关键词:亚细亚主义;亚洲连带;脱亚论;华夷秩序

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1)02-0036-08

DOI:10.14155/j.cnki.35-1293/g4.2021.02.008

一、问题缘起

幕末明治初期,日本面对西方侵略提出以“日清提携”“东洋连带”等亚洲联合的形式共抗欧美,社会民间也出现一批主张“兴亚”的社团组织,但这种情况随着日本国内自由民权运动走向低潮而逐渐恶化。到了19世纪80年代,早期亚细亚主义内容发生变化,日本内部出现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脱亚论”等侵略论调,之前被压制的“征韩论”也甚嚣尘上,这些带有浓厚侵略扩张性质的“亚细亚主义”话语预示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来到。20世纪之后,“亚细亚主义”逐渐沦为日本对外侵略的舆论工具,最终异变为构筑“大东亚共荣圈”的极端扩张主义,并使日本走向了太平洋战争的深渊。

二战后,日本学者竹内好就“亚细亚主义”这个命题展开过公开的讨论与研究,旨在使日本反思其百年来走过的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就此拉开战后研究亚细亚主义的序幕。从战后到现在,对亚细亚主义的研究从未中断,何谓“亚细亚主义”不仅困扰太平洋战争失败后急欲反省自身从而建立民族主体性的日本知识分子,也同饱受日本侵略和“大东亚共荣圈”欺骗的亚洲诸国息息相关。20世纪之后的日本迈入了帝国主义,在对亚洲的侵略与瓜分问题上与西方列强亦步亦趋。20世纪之前的早期亚细亚主义,存在着“亚洲连带”与“脱亚论”两种表述相悖的形态。学术界基本认同早期亚细亚主义存在过“连带”诉求,随着日本国内自由民权运动走向低谷,“连带”口号被日本侵略台湾和朝鲜的事实所掩埋,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对自身国权的伸张和对外侵略。但若观察19世纪80年代鼓吹“侵亚”乃至“脱亚”的大部分国权主义者的早期活动,都能发现其在7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中几乎都曾呼吁过“国国平等”“亚洲连带”,这就使得先后出现的“连带”与“脱亚”话语难以撇清与对方的关系而独自成

收稿日期:2020-02-03

作者简介:万齐岭(1995-),男,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近代史、琉球史研究。

说,我们更不能因将其归于不同阶段进行分析就忽视二者内在的承继联系。

1868年日本实现明治维新之后,以西乡隆盛为首的旧武士阶层大肆宣扬“征韩论”,但岩仓具视等内治派希望先稳定政局,学习西方为先,再伺机对外扩张。于是1871年,日本在“连带主义”占主流下与清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但日本很快便违反条规,于1874年兵犯台湾,并在1876年逼迫朝鲜与其签订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由此可见“连带”与“侵略”并非相斥,早期“连带论”并不保障连带对象间的和平。1885年福泽谕吉公然发表《脱亚论》文章,提出了“拒绝东方之恶友”,对邻邦中国和朝鲜不必客气,“依西人之法对待之”的侵略观点。为何早期“连带”未能发挥其团结亚洲各国的作用?相反却伴随着连带对象间的冲突?为何在面对西方入侵时日本能没有包袱的选择脱离亚洲与西方“同行”?

在那个波诡云谲的19世纪中后叶,日本面对东西方冲突的大变局,确实存在民间与政府、扩张与内治等诸多难以同调的现状,但若将目光纵向延伸,就会发现日本在看似矛盾的选择下潜藏着一条清晰连续的逻辑主线,即日本对亚洲区域秩序“中心”地位的争夺。由此出发观察近代日本早期的亚细亚主义发展形态,不论是提出与亚洲国家“连带”的口号还是选择拒绝亚洲邻国的“脱亚”路线,都无不指向这个主轴。从“连带”到“脱亚”的变化并非异变式的“转向”,它仅是外表看似矛盾但实质上异体同构罢了。日本不论是在前期提倡“日清连带”也好,还是之后鼓吹“脱亚论”也好,期间从未发生变化的便是对大陆政权为中心的旧华夷秩序版图的侵略扩张,且日本对“中心”地位的覬覦并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自古以来日本就一直处在区域中心的边缘,在“亚洲”概念出现之前,这一地区一直是由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体系所统辖。在“华—夷”概念下,“中心”对“边缘”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日本从未放弃“边缘卑下”对“中心尊贵”的价值对调与颠覆。^[1]

公元607年,推古女王派大礼小野妹子为使节携国书入隋朝:“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言语中充斥与隋朝地位平等之意。隋炀帝不悦:“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公元663年,日本为与大陆政

权争夺朝鲜半岛南部势力范围而同唐、新联军发生“白村江之战”,公然挑战以大陆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这次战役虽然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但是藉由武力再次染指东亚的野心从来不曾弥散。终于,到16世纪末日本再次侵略朝鲜半岛发动“壬辰倭乱”。要言之,日本一直对华夷体系的“中心”保持着警惕与距离,并适时对“中心”发难。如韩东育教授言:“‘华夷秩序’既是促进东亚共同或相近价值体系的形成、实现文明播化这一伟大目标之必经程序,同时,也为秩序所及的时间和空间布设了一个培育异己力量的理念框架。”^[2]到明清鼎革“夷进而为华”之际,华夷体系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等地出现以自我为中心的“小中华”圈,日本尤其生产了一个旨在与“大中华”相对抗的日式“华夷体系”。江户前期编纂而成的《华夷变态》中的“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更是清晰表达了江户日本的华夷观:清已非“中华”,明清鼎革后中原之“华”退而为夷,而日本就成了“中华”。^[3]

尽管“明清鼎革”冲击了日本的华夷观,但日本并未完全摆脱以大陆为正统中心的华夷秩序体系,朝鲜、越南、琉球等中国周边国家“仍循旧制”,对清廷称臣纳贡。幕府将军德川家康也多次通过琉球向中国表达通商之意,但未得中国认可。日本仅能在其日式“华夷秩序”下,通过岛津藩暗中控制琉球,获取这一域外小国的朝觐和效忠示意而沾沾自喜一番。在朝日交往方面,日方通过“朝鲜通信使”强烈要求朝鲜国王的国书不得沿用中国所用之“日本国王”称谓,应改用“日本国大君”之称谓,以此显示日本国“高人一等”之尊严。^[4]思想方面,虽中国的朱子学在江户日本经历不断被神道、古学派、国学派批判的过程,但儒学对日本的影响之深,使批判的话语终归还是落入儒学框架之内。故言,近代以前的日本虽承袭了自古以来对中国“华夷中心”的逸脱与反叛,但华夷秩序下形成的“上下尊卑”稳定结构使日本欠缺在体系内颠覆“大陆中华”的可能。日本仅能在遵守华夷秩序规则前提下自设“日式华夷圈”,在其圈内使琉球成为既朝贡中国又朝贡日本的两属之国。但这种大陆“边缘”地区自设小华夷圈与大陆“中心”对峙的僵持状况在19世纪中叶后被西方之“近代”力量所击破。

从历史长时段发展脉络来思考近代日本早期亚

细亚主义的话语与现实行为之间的关系,就能明白其并非充当西方文明的传播者而更多是亚洲霸权的觊觎者,其对亚洲诸国的“连带”与“脱亚”都是为满足其对外扩张和称霸亚洲的野心。如此便能看清早期“连带论”的虚假性和侵略性,这不仅使我们理解为何日本在“脱亚入欧”后不惜与欧美对抗也不愿放弃其在亚洲的权益,也利于我们有力批判日本战后沉渣泛起“的大东亚共荣圈”肯定论调和警惕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缓和表象下可能隐藏的经济政治冲突。

本文沿循幕末明治初期到甲午战争这一时间分期,着重探讨近代日本早期“亚细亚主义”中主流的两种形态——“连带论”与“脱亚论”之间的内在联结关系。思考早期“亚洲连带”为何没有得到亚洲诸国的积极响应从而达到共御外敌的使命?“连带论”作为亚细亚主义的初始形态之一为何很快就走向消亡?主张侵略的“脱亚论”对于“连带论”而言是异变还是承袭?“连带”与“侵略”在哪些条件下会互相克制,又如何防止两者的共谋?明治时期的亚细亚主义发展脉络当中是否存在抑制侵略扩张思想的生长空间?笔者从日本自古以来便存在的对区域秩序“中心”的逸脱与叛夺的逻辑出发思考,并结合史料史实分析近代日本早期亚细亚主义的实像,以就教于方家。

二、指向内部的早期亚细亚主义:“连带”的实像

刘峰在对日本近代扩张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探讨之时,认为其至少存在两种形态:即“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与“谎称区域本位的扩张主义”。前者内含“对亚洲扩张”和“与欧美对抗”的两面性,其中“与欧美对抗”通常以“亚细亚主义”形态表现出来且极易与“谎称区域本位的扩张主义”发生联系。要言之,该逻辑下的“亚细亚主义”可称“指向欧美的亚洲主义”。^[5]由此可见刘峰大体上承袭了早些时期学者盛邦和的观点,盛文称日本在明治初期面对西方时,亚细亚主义与攘夷论有重要的思想联结,其“锋芒最初所向,主要指向西方列强”^[6]。这说明学术界在此意见上多无争议。

二论在面对西方列强的东侵事实前看似颇有道

理,“西方入侵—东方抵抗”的思维图式使早期亚细亚主义主流——“亚洲连带”的枪口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向西方。但明治初期“指向西方的亚细亚主义”却并没有带来东亚国家期望中的亚洲连带,反而在此期间日本对周边国家的侵略行径无不昭示着连带的虚假性。与其称其是“指向西方”,不如称其是“指向亚洲内部”。

(一)对外扩张的前声:虚假的“日清连带”

甲午战前的亚细亚主义所关注的,实际是日本设法调整自身在东亚华夷体系边缘位置的问题。而日本对中国周边国家的侵略,则包藏着日本取代中国“中华”位置的野心。千百年来,日本在华夷体系辐射范围下产生的“指向中心(中华)”的抵抗与颠覆心理,在明清鼎革后仍不得不在文化上向大陆政权低头的不忿中积淀至深。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与西方的完胜,更为这种指向增添了另一种现实可能。日本学者荒野泰典称,幕藩体制下的国际视野缺乏对等意识,日本看待西方亦是“华夷视角”,因此日本并不希冀能一举颠覆东亚内部“小大中华”的位置,东亚之外仍需提防更为“中华”的西方对自身的威胁。当日本发现西方的侵略方式与习惯于“武威”逻辑的自身不无和谐之感时^[4],便开始毫无疑问地学习西方、以“文明开化”之名发起对大陆的旧“大中华”体制的解构,并为调整东亚“落差—权力”结构下自身的边缘位置而生产了所谓“亚洲连带”的话语。该时期兴起的“日清连带”“日清提携”等论无不显露出日本的处心积虑和远见。

考察当时的东亚社会背景,早期日本所提的“亚洲连带”实际上就是“日清连带”。早在1825年,会泽安就在《新论》中提出“日清唇齿”论:“与神州相为唇齿者也,清也”,应“相为犄角”共抗西方。^[7]但1823年佐藤信渊撰《宇内混同密策》内却言:“皇国欲开拓他邦,必先吞并支那国。……若强大的支那尚且不敌我皇国,更况其他夷狄乎。……支那划归我版图后,其他如西域、暹罗、印度诸国,则渐渐慕我之德、惧我之威,不得不叩首匍匐、跪地称臣。”^[8]两者言论看似对立,但实乃同一路线的两面。佐藤在华夷逻辑下思考如何取中国“中心”位置而自变“中华”,从而使周边国家慕“华”而称臣之时,会泽安就已在另一方向思考如何在西方尚未对东亚造成更大侵害之前,战略性地调整日

中“边缘—中心”的落差位置。二论均是指向亚洲内部自身地位的调整,无非一明一暗而已。但佐藤的激进论早在丰臣秀吉时代就已以“壬辰倭乱”失败而告终,从而证明在华夷体系内部对抗及取代“中心”绝非易事。佐藤在鸦片战争后改变看法,重新发表的《存华挫夷论》侧面印证了会泽安的远见,文中言“古人有云,唇亡齿寒,若清国不振”则不足以防备“欧罗巴人豺狼之心”^[9],同样提倡“日清唇齿提携”。1863年,作为会泽安忠实拥护者的平野国臣也在《制蛮础策》中言日清两国“相与合力,一其志,断然扫夷不予之以寸尺之地,逐诸洋外”^[10]。可看出日本在早期面对西方入侵威胁时就开始主张日清唇齿相依共逐夷狄了,这不仅是出于对自身安危的顾虑,也是考虑到当时中国仍是“老大帝国”的身份。但日本是诚心与中国连带提携吗?驱逐西方维护以中国为中心的旧华夷秩序统治是日本之所愿吗?

回溯历史,明清鼎革时期与鸦片战争后情况实有诸多相通之处,都存“外夷逐华”之危机,明清鼎革是鞑靼赶走朱明(彼时的中华),鸦片战争后是西方击溃清朝(此时的中华)。同是华夷“中心”的统治受到威胁,但日本对其不同的反应和策略则能使我们看出其中问题所在。明清鼎革,朱明南退,南明志士为抗鞑夷不得不向当时已统一日本的德川幕府求援,可南明向日本主动“乞师”甚至自降身份称日本为“正统中华”之时,日本也始终没有采取“日明连带”或“出师灭鞑”之策,反而利用“乞师”者的夸张叙述来夺取“正统中心”的地位(促使日人写出《华夷变态》),同时对“乞师”者兜售军备来获取经济利益。^[2]如此可见对日本而言,大陆“中心”政权衰落与否并不会给日本带来同向影响,甚至很难招至怜悯,相反“中心”的动摇可能会给“边缘”的日本带来“零和式”的崛起机会。因此反观19世纪西力东渐下的日本反应便可知,与其说“日清连带”是提倡合作抗欧,不如说是日本能从中有所获利的欺骗式话语。而日本所欲求之物,恰恰隐藏在“连带”话语之中。

以现在的眼光评判,早期“日清连带”的思想充斥着国家间平等合作一致对外的进步意义,但这种看法实乃极少数民间人士心中的和平幻想。日本学者狭间直树认为:“互相团结合作以对抗欧洲的‘亚细亚主

义’诞生了。早期‘兴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必须以亚洲内部的平等关系为前提,这是亚细亚主义的起点。”^[11]果真如此吗?为何亚洲内部的平等是亚细亚主义的起点?或曰为何后人要认同亚细亚主义的起点必须是亚洲内部间的平等?这恐怕多有二战后日本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心情吧。若以战后亚细亚主义学者的理论视角来看,不管是野原四郎^[12]还是竹内好^[13],都认同早期亚细亚主义“亚洲连带”的存在。但竹内好是以革命后的中国形象去代表亚洲,从而开展他的以“作为方法的亚洲”来抵抗西方的理论架构的。^[14]这里存在一个需要注意的前提,即固守“华夷秩序”的清朝与革命后的中国之间的身份差异。这提醒我们在理解竹内好的亚细亚主义研究思想之时,要警惕竹内好认同明治时期“亚洲连带”与他后来针对欧洲划出一条亚洲抵抗线时两者的时空错位。竹内好是将“亚洲连带”理念放到革命后的中国所代表的亚洲形象上去思考前者可能被埋没的思想生产性的。狭间直树教授在思考早期“兴亚主义”问题时没有对连带对象的性质和背景作过多考虑,而用“平等连带”一词盖过了连带对象之间华夷有别的身份落差。若回到早期“亚洲连带”话语的时代中思考的话,所谓亚洲内部平等的主张实际上是充满“非亚洲”的西方色彩话语,而较为符合华夷秩序逻辑的抵御外侮方式应该表现为藩属国集结在宗主国下与宗主国共同抵抗西方才对(不论其是否能成功)。难道在东亚承袭了千年的上下尊卑观念,在面对外敌时就能一举抹平“天朝”与“藩属国”的身份落差,在“上国”与“属国”平等携手下才能共御外敌吗?这显然是不合华夷逻辑且反历史的。思及华夷秩序仍是东亚国际关系的基轴,且丸山真男、荒野泰典等学者也已指明,日本当时是不会在西方“主权国家平等”的逻辑上主张亚洲国家间平等协作的^[15],因此当时日本对中国的连带要求,不过是面向西方这一“想象敌”提出的面向亚洲内部的目的性话语而已。

(二)“连带论”以外:早期显露的“侵亚主义”

西方威胁将至自不虚假,但日本提出跳脱华夷逻辑试图与中国共主的“日清连带”话语,其心思昭然若揭。正如王屏精辟的总结:“日中提携之所以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因为那时日本的实力不如中国。”^[16]“日清连带”的兴亚式话语不仅表达出日本

借机提升自身在华夷体制内地位的想法,而且以“连带”而不是趁机以武力入侵也看出日本面对实力尚存的中国时表现出的试探与些许敬畏。

但除了“日清连带”式的话语外,也存在表述上仍具浓厚侵略色彩的亚细亚主义话语。面对“黑船来航”的危机,吉田松阴主张“开国”,其1854年写于狱中的《幽囚录》中言,“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宣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一如内地诸侯;责朝鲜,使之纳币进贡,有如古之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17]次年寄给其兄长杉梅太郎的信中又曰:“吾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18]吉田松阴是日后众多明治政府高官的老师,如伊藤博文、桂太郎、山县有朋等皆出其门下,其思想对学生影响颇深。其《幽囚录》所言能看出以“日式华夷秩序”取代旧华夷秩序的野心,欲使亚洲各国俱纳贡于日本之下,“如古之盛时”;而“贸易失于外,以侵略施于内”的思想更是将日本向大陆“中心”扩张的欲望暴露无遗。这实际上是连“日清连带”都不屑提,直接挑战以中国为“中心”的旧华夷秩序。如此激进想法虽不符日本当时的内外国情而并未被直接采纳,但其弟子们都继承了老师的思想衣钵,并在日后次第紧张化的内外环境下加紧明治政府对外伸权的步伐。

明治初期,日本政局欠稳,对外方式尚不激进,“征韩论”也被压制。日本借西力东渐之机,首先提出“连带”,表面上共抗西方,实则是使处于边缘地区的自己能上升到与中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与“中心(中华)”并列。这既能使中国成为日本“西屏”以防西夷入侵,又能为下一步取中国而代之创造机会。在日本的努力下,中国终在1871年与日本签订了平等性质的《中日修好条规》。《条规》使日本天皇与清朝皇帝处于平等的位置上^[17],这代表近代日本终于实现了解构以中国为“中心”的旧华夷秩序体系的第一步,也预示着曾经连日本都不放在眼里的朝鲜^[19]将次第失去对日本

三、亚细亚主义的悖论:“连带”走向“脱亚”

随着《条规》的签订,日本在名义上对朝鲜确立了地位优势,原被压下的“征韩论”也开始甚嚣尘上。在此时期不得不提的思想家就是福泽谕吉,学界普遍认同福泽谕吉经历过思想的转向,由早期大谈“独立平等”的民权论转变为后期提倡对外强硬的国权论。可是丸山真男却认为这种转向实际上内含了福泽谕吉一以贯之超越特定状况的“相对性”思考。^[20]学术界批判丸山此论多有为福泽谕吉后期的激进言论“辩白”之意。^[21-23]但这并非意在否定丸山的“福泽论”,学界中警惕的是丸山“福泽论”被有意为福泽谕吉辩白的右翼分子所利用的可能,丸山对福泽谕吉思考方式的总结本身是有学术价值的。笔者认为福泽谕吉从1872年《劝学篇》到1885年《脱亚论》的发表,正是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穿插于福泽各时期的论说之中,那就是福泽一直在思考如何使西力东渐“为日本所用”。

自幼学习兰学的福泽谕吉使他能不拘束于幕府末期已腐朽不堪的旧制度思想,这也为他向外寻找改革日本的思想武器做好了铺垫。当时兰学是接触西学的唯一途径,在长崎和江户学习兰学之后,福泽终于得到机会留洋赴美,并在之后多次前往欧洲考察。这些经历对福泽的思想影响至深,促使他思考文明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回国后,福泽编撰了《西洋事情》(1866年—1870年),这预示福泽思想体系的开端。福泽得以开始相对化地思考西方文明,在东方儒教主义与西方文明主义比较研究中追求日本式的“文明”,其终极目的是建立以日本为亚洲文明之先驱,从而“指导”亚洲诸国受其“(武威)文明开化”的新东亚秩序。

福泽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撰《劝学篇》大唱“人人平等,国国平等”,表面上与“日清连带”不相龃龉,实则为之以后以“文明”国身份面对“野蛮”亚洲作理论准备。1882年3月他在《论朝鲜之交际》中言:“我辈忧朝鲜之事,希助其国入文明,遂武力干涉”^[24],提出“朝鲜改造论”。待同年壬午事变以失败告终后,福泽于次月在《时事新报》上发论,支持花房义质公使带军入朝鲜,目的是防备中国以及在朝鲜确定日本的落脚点^[25],提出“对清强硬论”,但因顾忌中国强大而作罢。到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福泽于9月4日发表日后被引用为“脱亚论”原型的文章《辅车唇齿之古谚不足为恃》,称不感中国败北之痛痒,不再同往日般恐惧中国,且痛斥“中国之败北则日本失其邻援”这种“唇齿”之论^[25],公然揭下了“连带”的假面具,并在年底支持朝鲜开化党人金玉均等人发动甲申政变,后遭清军及时镇压而告终。福泽以“文明”之名发起的对旧华夷秩序周边地区的蚕食几经失败,日本长期以来颠覆“中心”的行动再遭碰壁。福泽面对旧华夷秩序体制的“顽固”和中国强大的实力,愈感“改造朝鲜”之事已举步维艰——连对华夷秩序周边地区都难以施展手脚,更别提颠覆中国的“中心”地位了。次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发表著名短篇《脱亚论》:“我日本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其国民的精神早已脱亚细亚之固陋而西方文明转移。但此不幸的是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依我辈来看,此二国在现今文明东渐之风到来之际……不出数年就将亡国……我国不能待其开明而共兴亚细亚之业。唯有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必因其是邻国就顾及情面,一如西人即可。”^[26]福泽并未因壬午、甲申事变的失败而放弃“文明”之利器,而是选择以“文明国”身份公然宣布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旧华夷秩序体系,对中国与朝鲜也不再提“连带”“改造”之语,“一如西人”对待亚洲之方法以待之。

这事实上表明,福泽看到了“文明开化”与“亚洲连带”两者话语背后无法调合的根本矛盾:当利用“文明”来“改造朝鲜”达成“连带”目的时,势必触及华夷秩序的根基,招致华夷“中心”的顽强抵抗。“亚洲连带”的话语限定了日本在对待朝鲜和中国的问题上必须一视同仁,但“朝鲜改造论”意味着无视其宗主国中国的抗议从而必须伴随“对清强硬论”,而若主张“日清提携”则意味必须放弃“朝鲜改造论”中日本对朝鲜的利益诉求而维持现状。如此,“亚洲连带”的悖论必将使日本陷入立场和行动的两难之境。日本的区域边缘身份和华夷体制稳固的统治秩序使朝鲜和中国不可能认同“宵小倭国”提出的“文明开化”一策。另一方面,福泽也认为腐朽不化的中韩两国“只顾小利,不识大局”以及无法继续以“连带改造”掩饰军事入侵的事实,遂公然提出“脱亚”,使日本以西方身份重新获

得“进出亚洲”的“文明合理性”。

“脱亚论”之后,日本彻底摆脱了亚洲身份给它带来的束手束脚。福泽在脱亚论前后对中国和中国的藩属国极为贬低和污蔑,其以“文明—野蛮”观念对旧华夷体制的贬斥显露出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东亚秩序”的野心。福泽在1882年《论朝鲜之交际》中写道:“亚洲协心力抵御西方,其盟主为谁?我辈并非自夸,虚心平气以视之,亚细亚之中除我日本可任其盟主外还有谁国?”^[27]文中酝酿的“日本盟主论”终于在甲午战争之后得到了实现,而定调于16世纪末丰臣秀吉发动“壬辰倭乱”时意欲颠覆“中心”的设想终于在19世纪末明治政府这里成为了可能。

日本在旧华夷秩序内部争夺“中华(中心)”地位频频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在“华”的正统性上难以超越直接继承华夏文化的大陆“中心”。哪怕在明清鼎革之后,清也是承袭正统观念,强调“满汉一家”“华夷一体”。所以只有在异质的西方文明打败中国时,日本才有机会借其“文明—野蛮”颠覆“华—夷”观念。但日本在此并不是要建立西方平等主权式的东亚秩序,而是在“华夷旧身体”上穿上西方“文明新衣服”,以此来超克千百年来以中国为“中心”的旧华夷秩序体系。要言之,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早期亚细亚主义,主要指向为亚洲内部。日本从“亚洲连带”到“脱亚论”形成了一条连续的思想线索,即早期先大呼“日清连带”以抹平华夷逻辑下的地位劣势,再利用“文明”口号发动“连带改造”伪装下的亚洲侵略。当“连带”一语无法有效调合日本与旧华夷体系国家的利益矛盾时,日本便索性“脱亚”而以“西人之法”对待亚洲使其再次拥有“文明”上的优越性和行动合理性。贯穿“亚细亚主义”善变话语之下的是不变的对“中心”的争夺与倾覆,虽华夷秩序体系下生产的“自民族中心主义”种子也曾播撒到朝鲜越南日本等大陆周边地区^[28],但近代唯有身处区域边缘的日本完成了对华夷秩序设计的反继承。日本在西力东渐之时敏锐感知到东方将受到的冲击,同时意识到了压抑百年的“入主中原”机会再次到来。如此,日本能饶有深意地提出“日清连带”而不是如朝鲜越南等国醉心于“天朝庇护”之梦。在西方把目光主要放在大陆上时,日本能趁机效仿西方迅速“文明开化”并加入到侵夺亚洲的队伍。

当“亚洲连带”在《中日修好条规》修成并在日后随着壬午甲申事变的失败走向终结之时,当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在号称“文野之战”的甲午战争胜利欢呼声中走向顶峰之时,日本终于摆脱了中国主导的旧华夷秩序体系,利用西方侵略之机和“文明开化”的利器击溃了昔日“中华”,实现了“文野”对“华夷”“边缘”对“中心”的超克。

四、余论

拙稿以幕末明治初期到甲午战争结束为节点,结合史实史料考察近代日本早期亚细亚主义的具体内容,分析其话语与行动之间的亦同亦悖关系,发掘其背后潜藏的一以贯之的对区域秩序“中心”地位的颠覆性格。从长时段眼光分析来看,日本千百年来受“华夷秩序”影响至深,同时又较朝鲜、越南等地远离区域“中心”,导致其更易滋生“以夷变华”的反“中心”观念,这表现在历史上日本多次通过朝鲜半岛挑战大陆华夷统治秩序。直到19世纪,西力东渐动摇了亚洲的前近代区域秩序,也给日本颠覆大陆“中华”政权提供了文明利器,日本迅速开国,实行“文明开化”政策,对亚洲妄称“连带”后“脱亚”而去。“连带论”与“脱亚论”是日本早期亚细亚主义的一体两面,二者在日本以“区域边缘”对抗“华夷中心”的图式中分别构成对“中心”地位的趋平和超越,其外在悖斥下的内在合谋本质也在甲午战争日胜中败的结局面前显露无疑。从这一点来看,抛开甲午战争之后逐渐“右倾”最终走向法西斯主义化的极端亚细亚主义不谈,在甲午之前的早期亚细亚主义,也并未超脱“边缘”对抗“中心”的模式,这在长时段的历史分析下更是显而易见。

竹内好曾对亚细亚主义如此定义:“亚细亚主义并不是具有实质内容并且在客观上可以界定的思想,而是一种倾向。它与膨胀主义或侵略主义不完全重合,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国粹主义也不完全重合,同理也与左翼国际主义不完全重合。但同时又与上述主义均有重合部分,尤其与膨胀主义有更多重合之处。”^[14]日本早期的“连带论”与“脱亚论”虽表面上分别鼓吹“日清提携”和“脱离清韩”,却都与膨胀主义有最大程度的重合,这两种形态的亚细亚主义是日本该

时期对外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倾向”,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得表述上相悖的二者在终极目的上划为同一。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在充当了对外扩张的舆论工具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其中确也存在少许竹内好所说的“健全原型”。^[14]如早期“兴亚家”曾根俊虎在中法战争后对中国的诚心合作意愿^[17],或者樽井藤吉提出的以对等为前提的《大东合邦论》展示了日朝两国同心协力共抗西方的理想画面,甚至20世纪后冈仓天心《东洋的理想》中提示的以亚洲为尺度而非以西方为尺度的亚洲原理等。^[26]但这些竹内好所称的代表亚细亚主义的“心情”或“原型”却并未上升为能抵抗扩张的理论,1893年的《大东合邦论》未能阻止次年甲午战争的爆发,反被政府作为日本吞并朝鲜的欺骗话语使用;甲午战争之后,亚细亚主义次第走向彻底的右翼化和侵略化。1903年出版的《东洋的理想》同样没能阻止次年日俄战争的到来,之后其提倡的“亚洲一体论”沦为“大东亚共荣圈”的舆论工具。宫崎滔天对孙中山的无私支持仅成为美谈,北一辉寄希望于中国革命和解放亚洲,却在死后成为法西斯主义者鼓吹的“开战先锋”。此外,还有不少浪人志士受政府指派进行各国间的政治行动,但作为亚细亚主义者,他们也并非无时无刻与本国利益保持步伐一致。^[26]这些时而闪露光辉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几乎无一不走向消亡和被体制化后的滥用,在绝对的国家利益和强硬的政府推行之下,一切可被利用的思想都将走向无思想化,一切与侵略扩张主流相悖的思想也将无处喘息。从早期亚细亚主义萌芽和成长时期就不只存在一种选择的可能,但历史只能实践出一种选择,承认亚细亚主义复杂多样的形态和悖论性格,有利于我们发掘其中被主流所掩埋的充满时代张力的思考和思想原型,使亚细亚主义研究避免落入单一化和绝对化的圈套。捋清历史长时段发展态势的脉络,有利于我们看清特定时代条件下“连带”与“侵略”的共谋关系,从而在亚细亚主义研究中警惕与美化侵略的右翼史观合流。

参考文献:

- [1] 韩东育.从“请封”到“自封”:对日本“自中心化”过程的立体观察[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7(4):104-105.
- [2] 韩东育.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

- 想过程[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3-4,155-183.
- [3] 林春胜,林信笃.华夷变态(上册)[M].东京:东洋文库,1958:1.
- [4] 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22,57.
- [5] 刘峰.近代日本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两种类型:以大川周明的思想理论为中心[J].世界历史,2017(6):90-91.
- [6] 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J].历史研究,2000(3):125-126.
- [7] 瀬谷义彦,今川三郎,尾藤正英.日本思想大系(第53卷)[M].东京:岩波书店,1973:398.
- [8] 佐藤信渊.宇内混同密策.日本经济大典(第18卷)[M].东京:启明社,1929:569.
- [9] 泷本诚一.佐藤信渊家学全集(下卷)[M].东京:岩波书店,1925:863.
- [10] 井上哲次郎,上田万年.勤王志士遗文集[M].东京:大日本文库,1941:125.
- [11] 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
- [12] 下中邦彦.亚洲历史事典(第6卷)[M].东京:平凡社,1960:6.
- [13] 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第9卷)[M].东京:筑摩书店,1963:10,12,67,106.
- [14] 竹内好.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竹内好评论集(第三卷)[M].东京:筑摩书店,1966.
- [15]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五卷)[M].东京:岩波书店,2003:62-63.
- [16]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6,95,211.
- [17] 山口县教育会.吉田松阴全集(第1卷)[M].东京:岩波书店,1936:596.
- [18] 日本思想大系(第54卷)[M].吉田常吉,藤井省三,等校注.东京:岩波书店,1978:193.
- [19] 韩东育.东亚的礼争[J].读书,2015(6):35-36.
- [20] 丸山真男.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M].区建英,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5.
- [21] 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解构“丸山谕吉”神话[M].刘曙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
- [22] 子安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精读[M].东京:岩波书店,2005.
- [23] 韩东育.福泽谕吉与“脱亚论”的理论与实践[J].古代文明,2008(4):71-73.
- [24] 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八卷)[M].东京:岩波书店,1963:30,249,31-32,239-240.
- [25] 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文化间的「日本」[M].台北:远流图书公司,2001:31-32.
- [26] 孙歌.竹内好的亚洲主义研究[J].开放时代,2019(1):122-123.

(责任编辑:冯起国)

The Complicity of “Joint” and “Out of Asia”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paradoxical character of “Asianism” in early modern Japan

WAN Qiling

(The Centre for Studies of Fujian and Taiwa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ism” in early modern Japan can not only capture the trend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and public opinion direction, but also help to understand why Japan, as an Asian country, persisted in launching fascist aggression war against east Asia and even the worl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rebellion and confrontation against the “center” of the Chinese-barbarian system have almost run through all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Japan, which is on the edge of the regional order. Being located on the “edge” of the Chinese-barbarian system makes it possible for Japan to relativize and overcome the “center” of the mainland, which is also the deep historical reason for the expression of the paradox of early asianism. In the early Meiji period, western powers gradually gave Japan the opportunity to destroy the old Chinese-barbarian system. At this time, “asianism” was pointed at the inside of Asia. Japan outwardly advocated “Asian joint”, but secretly quickly “westernized” and got its hands on east Asia. They seem to be mutually exclusive, but they are the two sides of aggression and expansio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tatements of “joint” and “out of aisa” are the same in front of the fact that they won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Key words: asianism; joint; out of aisa; the Chinese-barbarian system